

曹植

新探

钟伏民

著

黄山书社

曹 植 新 探

钟 优 民 著

黄 山 书 社

1984年·合肥

994120

封面设计 诗 韵

曹 植 新 探

钟优民 著

黄 山 书 社 出 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183,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8,500

统一书号：10379·1 定价：1.20元

目 录

一、建安时代与建安文学·····	(1)
二、曹植的家世·····	(21)
三、曹植的经历·····	(31)
四、曹植的哲学思想·····	(52)
五、曹植的政治思想·····	(78)
六、曹植的文学理论·····	(100)
七、曹植的诗歌·····	(128)
八、曹植的辞赋·····	(183)
九、曹植的散文·····	(221)
十、曹植文学上的成就与影响·····	(247)
后 记·····	(292)

一、建安时代与建安文学

汉末建安时期，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光辉灿烂时代。建安时代，以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建安纪元（公元196—220）而得名。史学上所称建安时代往往超出这二十五年，大体指汉灵帝末至魏明帝初的四五十年。公元235年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说：“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三国志》注引《魏略》）“衰乱”系指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农民大起义，由此可见三国时已有人把这四五十年看成一个具有共同特点、紧密衔接的历史时期。建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它在政治、经济、思想诸领域都呈现出迥异于前的鲜明特征，建安文学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条件下诞生的。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它的发展，打破了汉代几百年来文坛的沉寂，开辟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新时代，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峰。

—

建安时代是一个矛盾重重、斗争反复的变革时期。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透顶，政治极端黑暗，卖官鬻爵，贿赂成风，上下沆瀣一气，官场如同交易所。灵帝公开在西园卖官自肥，太尉段熲、司徒崔烈等皆以巨金买到高官厚禄，曹操父曹嵩也是“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后汉书·曹腾传》）仕途上充盈着鲜廉寡耻之徒，正如《桓灵时童谣》所讽刺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雌。”大臣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倾轧，集中表现为宦官与外戚两大官僚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和“党锢”之祸。在这种反动腐朽政权的统治下，又继之以水、旱、蝗、疫，土地荒芜，农村破产，大批农民走死逃亡，社会上到处存在“万民饥流”的问题，进一步激化了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义军响亮地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将立”的革命口号，所到之处，烧官府，杀污吏，摧毁很多豪强坞堡，消灭大批地主与官僚，以摧枯拉朽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不久即被统治集团的联合武装镇压下去，继起的各地黄巾军和太行山的黑山军还坚持战斗了十几年，充分反映出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意志，正是这一强大的阶级斗争的威力，为比较开明的政治局面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在东汉帝国崩溃的废墟上，地方世家豪族的势力空前膨胀，自此迎来一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混乱时代。最初是以夺取了朝廷大权的董卓为一方和以袁绍为盟主的另一方的互相攻伐，混战不休。董卓当权时，法令苛酷，

冤死者千数；其部卒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攻陷长安之役，被屠杀的老少，相枕于路，惨不忍睹。接着又展开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之间的较量，袁氏是东汉后期很大的一家豪族，自袁安以下，曾四世作三公（汉司徒、司空、太尉为三公，为朝廷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董卓西逃后，袁绍成为北方实力最强的割据势力。他实行豪族强权政治，其管辖的区域，“豪族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衙鬻家财，不足应命。”（《三国志》注引《魏书》）曹操在政治上采取打击豪族、抑制兼并和澄清吏治的开明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小地主的利益。曹操的军队是在公元192年击败青州黄巾军，得降卒三十万人，并从中选拔精锐的基础上壮大起来的。公元200年，官渡一战，大败袁绍，曹操一跃而为北方最大的实力派。公元208年，赤壁一战，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基本确定。从此，三国的统治者都想成为统一天下的明君，三国之间的斗争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到公元263年魏司马昭消灭蜀汉、公元280年晋司马炎消灭孙吴，方才打破纷争数十年之久的三国局面，中国再次得到统一。

在当时社会诸种矛盾发展过程中，民族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在交织展开。东汉末年，正值内地多事之秋，朝廷无暇外顾，北边乌丸、鲜卑等部族，经常寇暴城邑，杀掠边民，并且参与中国的内战。灵帝时，中山太守张纯叛国，勾引三郡乌丸“寇略青、徐、幽、冀（今河北、山东一带）四州”。三郡乌丸还参加袁绍与公孙瓒、袁尚兄弟与曹操之间的战争。袁绍父子引狼入室，妄图借用外来力量维护自己摇摇

欲坠的反动统治的丑恶行径，是很不得人心的。公元202年，袁尚派遣部将高干、郭援率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呼厨泉联合侵犯河东，派密使与关中诸将马腾等迓和，腾等阴许之。公元207年，曹操率师北征，出卢龙塞（今喜峰口），东向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登白狼山，大败三郡乌丸和袁氏兄弟的联军；公元218年，又遣子曹彰率军击败代郡、上谷乌丸和鲜卑轲比能侵扰边地的联军。这些战役的胜利，虽然未能最终解决边患，黄初（魏文帝年号）以后，北方部族侵扰边塞的事件仍不断发生，但在当时对于保障边民免受落后部族的寇掠和破坏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东汉末年，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上两极分化的现象极为严重，富室巨贾，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穷奢极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相比之下，广大贫户小民，则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所，过着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灵帝以后，更由于天灾人祸迭至，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大破坏，经济很快达到崩溃的地步，国无困仓，民无存粮，饥馑流行，到处出现人食人的惨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兵荒马乱、饿殍遍野的艰难岁月，连地方割据者的军队也抢不到足够的粮食，袁绍带兵在河北靠吃桑椹过活，袁术率部在江淮靠吃螺蚌充饥，曹操所部的军粮里甚至杂有人脯，以补粮食之不足；朝廷里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亦不能幸免：“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三国志·董卓传》）战争之后，血肉膏

于锋刃，白骨蔽于原野，曹操有一次带兵路过故乡谯地，发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三国志·武帝纪》）这种荒凉凄惨的景象一直继续到魏明帝太和年间还是“千里无烟，遗民困苦”，很多州郡未能恢复过来。面对社会经济所遭到的严重破坏，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三国时期各国的统治者都在积极考虑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以保证军需民用的问题。曹操早在公元192年就采纳毛玠“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建议，采取切实的措施组织农业生产。公元196年，曹操正式颁布《置屯田令》。以枣祗为屯田都尉，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由于屯田的设置和推广，数年之内，所在积谷，仓库皆满，既解决了军食，又安置了大批流亡的农民，稳定了社会秩序，促使早先中原大乱时从关中流入荆州的十余万户，纷纷来归。在发展屯田的同时，曹魏还注意兴修水利和改进耕作技术，以扩大耕地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逐步恢复了黄河流域残破的经济。当时南方的吴、蜀地区，农业经济也都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总的来看，魏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已远远超过吴、蜀，这也是魏国司马氏集团最后得以消灭孙吴和刘蜀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东汉帝国的日趋衰落，社会思潮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汉武帝为了使刘家王朝长治久安、万世不衰，在思想领域曾经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独裁政策，妄图禁锢人们思想的发展。在这种文化政策的影响下，宣扬儒家思想的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一般腐儒都把经学

章句奉若神明，视为千古不易的教条，繁琐考证，家法传授，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桓、灵以后，朝纲日陵，国隙屡启，培植儒学人才的官办的“太学”、私设的“精庐”纷纷倒闭，经师弟子飘泊四方；加以董卓迁都之变，皇家图书，竟共割散，荡然无存。儒学教育经此摧残，顿呈一蹶不振局面。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血风腥雨里崛起的三国统治者，从其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经学章句对争夺政权毫无用处，所以皆采鄙夷不取的态度，魏国“自曹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宋书·臧焘传论》）；吴主也是“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三国志》注引《吴书》）；蜀主刘备遗诏教子，亦复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三国志》注引《诸葛亮集》）从这里不难看出建安时代社会思潮已远远脱离经学章句的羁绊，代之而起的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各种宗教和哲学，清谈玄学自此逐渐兴盛发达起来。汉末的清谈，开始于人物的品评，进而发展为对朝政的批判，党禁以后，又转到乡党人物的批评。曹魏之世，清谈的主要内容变而为老、庄的哲理，从《老子》、《庄子》等书里引申出来的玄学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主导思想。最初的玄学，即何晏（公元？—249）、王弼（公元226—249）的玄学尚未摆脱儒学的影响，他们企图把儒、道加以调和，反映了社会思潮由崇尚儒学向崇尚老庄之学过渡的特点。

东汉末年，由于社会的极度动荡，上层统治集团深感自己地位岌岌难保，广大人民的生活更是极为痛苦，造成

了宗教传播的良好土壤。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张道陵创立的道教开始兴盛，推老子为教主，声称神咒可以帮助人消灾去病，在民间颇为流行。当时的农民领袖曾利用道教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收到很好的效果。汉末流行的“黄老道”，尊奉黄帝、老子，下分两个支派，中原和东部地区流行的是以张角为代表的“太平道”，西南地区流行的是以张鲁为代表的“天师道”（亦称“五斗米道”）。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统治阶级严禁道教活动，但它的影响并未消失，往往以其他面貌出现：“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皈依。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高僧传》卷一）说明魏国的出家人实际上是披着佛门外衣的道术之士。道教盛行的同时，佛教的传播亦有进一步的发展，佛经翻译有所增加：“曹魏从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四十六年间，译者五人，译经十二部十八卷。”（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统治集团中开始出现一批虔诚的佛门信徒，著名的如丹阳的土豪劣绅笮融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一方面勾结地方官府霸占广陵、彭城等三郡赋税，并聚徒数百，杀人越货，无所不为；一方面大建佛寺，所造铜佛，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其佛寺里供养僧徒三千余人，诵佛念经。又扯起免除徭役的旗号诱惑四外人民前来听经受道，受其引诱者达五千余户。每开佛会，布施酒饭，设席长至数十里，就食者万人以上，所费以巨亿计。从笮融身上充分反映出反动统治阶级提倡佛教、超度众生的虚伪嘴脸。建安时期的佛教中心，北为洛阳，南为

建业(今南京)。曹魏地区经陆路与西域有交通,南方经海道与交趾、天竺等国相往来,这是佛经输入的两条重要通道。

建安时期社会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经学章句在思想界的垄断地位虽已打破,但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儒学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建安初期,烽火四起,儒学的名师高徒,隐居乡里,闭门授受,进修经书者仍不乏其人,如长安宿儒栾文博,有门徒数千;大儒贾洪历守三县令,所在辄开除廐舍,亲授诸生。三国的统治者非但未曾从根本上否定儒学,反而颇为重视利用儒家政治上偏重保守的思想来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魏国初建,曹操就采纳袁涣“文武并用”的建议,明确提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治平尚德行”的施政方针,这与曹操晚年提倡“仁义为名,礼乐为荣”(《秋胡行》)的思想是一致的。曹丕、曹叡在尊儒倡学上步子迈得更大,曹丕曾诏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三国志·文帝纪》);并于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重用通经儒生。太和二年,曹叡下达《贡士先经学诏》:“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太和四年进一步下达《策试罢退浮华诏》,提出“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朕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令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等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三国志·明帝纪》)建安文人的处世哲学也多离不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

善其身”一套儒家古训。很多建安作家，自幼就在儒学里熏陶，也难以彻底摆脱儒学的影响，邺下之会，他们仍旧“妙思《六经》”，对儒家经典辛勤探索，他们对儒家思想的突破并非某些评论家所夸大的那样神乎其神、一刀两断。在儒学复兴的同时，谶纬之学继续流行，曹丕曾引用大量谶纬证明自己就是“黄家”，以应汉末“黄家当兴”的预言；刘备引用大批谶纬里有“备”字证明自己该做皇帝；孙权亦大造符瑞，证明自己也得天命。所有这些都说明儒家传统的根深蒂固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里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建安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历史发展阶段，但乱中有治，破坏中有建树，大分裂中有小统一。三国鼎立，并非纷乱无章，而是各自秩序井然，地区性的统一政权相当稳固，三国正是这样一个由割据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这就是包括曹植在内的建安作家活动的历史舞台和时代背景。

二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般所称的建安文学，主要是指建安时代的北方文学，这期间江南文风不盛，作家作品很少。鉴于建安文人后来多成为曹氏父子的幕客，所以一般学者多把建安文学解释为魏国文学，这是不太确切的。因为当时很多文人在归附曹魏前，皆已名噪文坛，创作过不少名篇。同时象孔融、祢衡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是“身在曹营”、心扶汉室的曹魏政治上的反对派，硬说他

他们是魏国文士，更名不副实。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继往开来、成就辉煌的重要阶段，时间虽短，却出现那么多天才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提供如此丰富的艺术经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繁荣兴盛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俊才云蒸，群星灿烂，形成一个“盖将百计”（《诗品》）的邺下文学集团。文坛领袖是曹氏父子，首屈一指的名家有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祢衡、蔡琰、吴质、王朗等，确实是“彬彬之盛，大备于时”。他们当中才华横溢的大有人在：曹操于乐府、书法、音乐、围棋、方药等，无不擅长；曹丕博闻强识，才艺兼备；曹植文才富艳，下笔琳琅；应玚才敏善诵，读书五行俱下；阮瑀能琴善音，书记翩翩；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第二，文体大备，作品丰富。建安诸子在继承和发扬前代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都各有自己所擅长的文体或熟悉的形式，如陈琳“章表殊健”，刘桢五言诗“妙绝时人”，王粲“善于辞赋”，曹植“诗丽表逸”，曹丕“乐府清越”，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淳“亦含论述之美”。一般说来，建安诸子不象其他朝代作家那样很多人都把力量放在某一种文体上，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因而建安时代各种文体都有名篇留世。这个时期创作园地奇葩盛开，五彩缤纷，文人作品留传至今者尚有千余，其中很多精品将永远放射出不灭的光芒，成为子孙万代宝贵的精神财富。第三，论文风兴，

批评活跃。建安诸子，邺下盛会，“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赋诗论文，此唱彼和，一直传为文坛佳话。当时论文之篇，著名的有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吴质的《答魏太子笺》和杨修的《答临淄侯笺》等，他们对文学价值、批评态度、作家才气、作品风格等问题都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其中有的至今尚不失为振聋发聩之言，对指导创作和批评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第四，文集编纂，成绩显著。随着人们对文学价值认识的提高和作品的积累，自然出现整理、编辑作品的客观需要。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水平的条件下，编纂工作主要是官办。曹丕从“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认识出发，十分重视文章的搜求、整理，徐干、陈琳等亡故后，他热心地“撰其遗文，都为一集”（《与吴质书》）；甚至“募天下有上孔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后汉书·孔融传》），用心颇为良苦。他还诏令常王曹象“撰《皇览》，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三国志》注引《魏书》）曹植、曹叡都搞过文集编纂工作。建安时代无名氏所作的《孔雀东南飞》这样规模恢宏的长篇巨制之所以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与建安文人重视作品的整理和流传不为无关。

建安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达到较完美的统一，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建安作家继承和发扬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的面貌，表现出时

代的精神，他们的作品内容相当丰富。首先，建安时代大分裂、大动荡、大破坏所造成的社会现实在创作上有着真实的深刻的反映。当时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满目疮痍的景象，后人从建安作品中所看到的，往往胜过不少史书的记载。建安诗人将他们在乱离之世的所见所闻，无多修饰地熔铸于作品之中，创作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历史画卷。被誉为“汉末实录”的曹操的《蒿里行》（“生民百遗一，令之断人肠”），令人读后“鼻酸而哀”的王粲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一片阴森恐怖，惨不忍睹。蔡琰的《悲愤诗》揭露董卓军队中的胡兵屠杀人民、抢掠妇女的残暴罪行以及广大人民妻离子散被奴役、被侮辱的悲惨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建安诗人对人民疾苦的关注，是建安文学具有高度人民性的重要表现。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曹丕反映“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这种贫富对立的《上留田》诗，有反映征夫游子远戍行役之苦的《苦寒行》（曹操）、《别诗》（应玚），还有徐干反映征妇怨女的痛苦与哀愁的《室恩》（六首），阮瑀揭露封建家庭关系中冷酷无情的阴暗面的《驾出北郭门行》诗等。总之，建安文学一变两汉辞赋以歌颂帝王宫廷生活为中心的旧文风，转向重点描写黑暗的社会现实，无疑是文学发展的重大进步。其次，慷慨激昂地高歌统一国家的理想，是建安文学的又一个重大主题。建安时代乱离的社会让人们吃够了苦头，“民之欲安，甚于倒悬”，国家的统一是社会安定与和平劳动的根本保证，是广大人民梦寐以求的。同时，动荡的现实，对封建剥削

亦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地主阶级中大部分人也要求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以便安稳地享受，曹操在《对酒》诗里所描绘的封建理想王国的光明图景，正是地主阶级政治理想的集中反映。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很多诗人，都曾满怀热情地歌颂过曹魏在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北中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如王粲的《从军诗》（其四）写随曹操东征孙权，表达了作者愿为统一全国的事业作出自己贡献的思想感情。再其次，吟咏悲凉的人生是建安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感伤文学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建安之世，整个中国内忧外患，军阀割据，战乱连年，外族寇扰，边境不宁。广大人民遭受着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苦不堪言。建安诗人在这种普遍出现的社会灾难面前，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形诸楮墨之间，作品难免不带有浓重的悲伤气氛。如蔡琰历经人生沧桑，倍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悲愤诗》），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精神的创伤长久未能平复。刘桢慨叹“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低昂倏忽去，炯若风中烛”（《失题诗》），人生无常、命运难期的苦恼何其深沉。为了摆脱人生的艰难和痛苦，很多建安作家纷纷转向酗酒与游仙，寻求精神的解脱，这就是当时大量宴游诗、游仙诗产生的思想基础。

建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极富创新，取得了杰出的成绩。首先，建安文学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宋书·谢灵运传论》指出：“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